

喜欢用旧砖瓦盖新楼的中国建筑师王澐，坐在新加坡河畔旧建筑——浮尔顿酒店二楼露台——接受访问，他背后是最近五年才冒现的滨海新市区，一栋栋闪闪发亮的玻璃大楼在很短时间就占据了天际线。

只是从露台一隅瞥到的风景或许并不能代表新加坡全貌，但是毋庸置疑，大量摩登建筑的入侵也跟他很多东西一样，造成地方特色消失。这种看起来集流行与效率于一体的所谓国际化，在王澐看来是可怕的：他为了抵制这股力量，一直坚持自己的设计要传统、朴素，甚至乡土。

王澐(49岁)剃平头、戴眼镜，喜欢一身黑衣，他刚在去年获得“建筑界诺贝尔奖”之称的普利兹克(Pritzker)建筑奖，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建筑师。

王澐和妻子陆宇常住杭州，两人设立的工作室叫业余建筑师工作室。他喜欢用拆楼剩下的砖瓦拼贴在新建筑外墙，打造一种沉静和质朴。他爱唐诗和书法，建筑作品多是大学、博物馆、画廊和私宅，甚少涉足有气派的商业建筑，获奖时还被《南都周刊》戏称为“业余设计师”拿建筑诺贝尔奖。

典型新加坡式讨论触及社会科学

王澐这次到新加坡，是应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邀请，作为该中心国际咨询团一员，就国际城市发展趋势和科技及设计运用贡献良策。此次是他第二次到新加坡短暂逗留。

在人口增长、土地稀缺的大背景下，问题自然集中在新加坡如何以创新方式打造宜居城市。记者原本以为王澐会谈到高密集约建筑或者垂直绿化，但是这位以批判体制出名的建筑师指出，要让城市继续有活力，政府应该适当退出。

他不讳言，这次来新开会时注意到，政府部门和专家间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政府、社会与技术，没触及社会科学。

“好像大家的兴趣都是只要政府管好了，剩下的就是技术解决问题，基本上是非常典型的新加坡式讨论。真正的文化艺术，政府当然需要支持，但一般肯定不是政府做出来的东西。这个社会spontaneous(自发)的努力特别重要。要怎样才有一个气氛，这需要讨论。政府应该在管理的同时适当后退，留出空间给大家，使

得大家觉得生活有归属感，有自己做出来的满意和愉快感。”

王澐认为，这当中的过程并不是建筑师能左右的，建筑师最多只是提供一个条件，更多需要的是人们的兴趣。

“这其实是space(空间)和event(事件)的关系，建筑师是把space创造出来，然后给一些暗示，但event会不会发生还不完全确定。”

传统是社会走向未来的原动力

不鼓励政府过度介入(城市打造)的论调极少从国际专家口中听到，王澐观察到的是：每个发达城市都会面对拯救特色的困境；而新加坡特别困难，因为这里的传统面貌并不突出。

当记者问他何以见得时，他微转过头看着后面，说：“从这个状态就能意识到。”

他说，传统的存在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原动力，“这个传统是老英国或是老华人传统都不重要，甚至是60年代、70年代的东西，都变成传统了。”

但是眼前这个小国明显面对空间局促的问题，在保留传统和开辟新空间之间是否有必然的矛盾？

王澐援引访谈时跟记者聊到的本地摩天楼组屋达士岭(Pinnacle@Duxton)为例说，既然政府能在中心区建社会住宅(social housing)，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他说：“一个好的城市需要回忆。甚至人们可能一开始都没意识到，这方面的意识需要唤醒，因为太长时间看物质、技术和利益的东西，这不是简单用生产来取代的。传统的东西弄掉很容易，你要它再发生，对不起，100年都未必再发生；重新塑造文化特别困难。”

新加坡需要文化价值观的讨论

“接下来，新加坡不只是贸易和技术的中心，它需要有一个文化价值观上清楚的讨论，让大家有可能共享；因为，它作为人造城市，对其他城市有深远影响，大家都来学，所以学回去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很重要。”

一个小时的访问结束后，一行人搭电梯到达达士岭50楼高的空中花园鸟瞰风景；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组屋都是这个城市的主要面貌。

建造公共住宅是中国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，王澐透露，他早几年就提出想参与公共住房设计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没有进展。见到新加坡政府能在这样的黄金地段造房子给一般居民住，他表示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。

“这在今天是很理想主义的，这其实比中国还带有共产主义色彩，连中国政府都不敢想这个问题，因为成本太高了。不过问题也就在这里，这意味着国家必须持续繁荣，在跟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必须维持领先。”

王澐小档案

- 1963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
- 毕业于南京工学院(现东南大学)建筑系
- 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，曾在哈佛大学讲学
- 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没接任何设计项目，而是通过和工匠一起工作获取经验，后来跟妻子一同创建“业余建筑工作室”
- 代表作品：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、宁波博物馆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
- 2012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，成为自1979年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个得奖的中国建筑师，其他获奖著名亚洲建筑师为：贝聿铭、丹下健三和安藤忠雄；今年获奖者是伊东丰雄



▲王澐一站上百多年历史的加文纳桥(Cavenagh Bridge)，马上说这恐怕是新加坡最美丽的桥，看得出是英国殖民地时期的东西，“因为它很实，很朴素，甚至有点笨笨的。”(邹福梁摄)



▶宁波历史博物馆地处刚被纳入城市一部分的乡村，博物馆外形是一座人工山，下半段是简单的长方形，上半段是裂开的山体，外墙是混凝土与回收砖瓦结合体。



▲王澐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被誉为“中国最美校园”，以走道带出的曲线和校园外的丘陵起伏相呼应。(Iwan Baan摄)

中国建筑师王澐谈打造宜居城市

政府管理时应适当后退

东南网记者 杨萌 @yangmeng@sph.com.sg

政府应该在管理的同时适当后退，留出空间给大家，使得大家觉得生活有归属感，有自己做出来的满意和愉快感。

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中，王澐谈到宜居城市的打造时不改批判体制本色：不久前荣获国际城市发展趋势和科技及设计运用贡献良策奖、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澐，应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邀请，

新加坡社会缺乏魔力

新加坡是个很特别的成功案例。能做到居者有其屋非常不容易，大家要爱惜这个成功，而不是说还要有什么愿望要实现，还要怎么样。除了经济上的努力，很重要的还是社会特殊的一种文化发展，对生活的满意度不完全是物质的问题，很大一部分是文化的问题。

这个社会可在更微观的地方更开放，无论是生态或社区方面的努力，甚至是生活里小小艺术的繁荣，这些恐怕是更重要的工作。接下来如果要变化，应该是尝试让这些事情能发生，因为它们需要空间。

比如我们现在对新加坡的印象是很干净、很整齐，但不是很有意思，包括很多人说新加坡需要人才来支撑，但是这里不是很多人才喜欢的地方。如果只是为了挣钱，可能会来一下，说是长期待在这里，很多人可能并不会选择。这说明你这个社会缺东西，一个好的城市是需要一点魔力的。我们可以说它的魔力不够。而这不完全是建筑的问题，建筑只是其中一部分。

现代城市化的不可持续

中国要搞乡村化，其实就是城市里没地了，打农村的主意，抢占农村土地。这其实就像吸毒一样，身体是不能支持的，是不可持续的。中国城市通过要人们大量消费来提振经济，全球也都在讲通过技术资金来解决，但全球资源就这么多，不可能支持这样的模式。

所以欧洲人其实已经过于富裕，生活水准必须下调；这是带有道德色彩的想法，是为长远生存自我约束。我总是说，中国社会的最高水平就是小康社会，有那么大量的人口，小康就是到顶了，而且要自我约束；我们只达到小康就好，不要老是说要超过欧洲，然后还要超过美国。这才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。

垂直住宅导致公共性流失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欧洲为了尽快恢复元气，让人有容身之所而建造了许多社会住宅，但是因为求快和便宜，多是使用混凝土，这是以前的贵族看不起的。新加坡的社会住宅(组屋)也有社会住宅的基因。

到了80年代末，现代建筑开始精细化，加入了艺术家的努力，让穷人的住宅也变成了新理想。这是很成功的塑造，让你觉得特别的摩登，但想想又觉得这是个巨大的阴谋。

这个住宅改变了观念，让你觉得住在高层住宅，基本上不需要跟邻居有关系，让所有人接受一个孤立的状态，社交生活都不在这里发生，而是在外面。所以我们说，现在的社会是反社区、反社会时代。在这样垂直住宅，想建立公共性就特别难。

保持自然和传统需要创新

很多人以为回归自然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在这个时代，回归自然反而需要大幅度创新。比如，现代施工方式已经习惯了用混凝土进行现场浇筑，省时省力；但是，我用很多垃圾一样的细碎细瓦，这些未必能跟混凝土匹配，这需要跟施工公司讨论，做很多实验，找到合适的比例。

不只是要造上去，我对艺术效果也非常在意，不希望只是做假模假样的，这需要更微妙的施工控制。这让工人很辛苦，因为他们可能并不能体会我要的那种感觉。有一次，有个工人砌砖，一直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要求，做得快要崩溃了，后来他才发现，其实我要的只是他在家里的做活的那种工艺。